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Sexual Violence in YuXian  
Their War is Not Over*

#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 日军性暴力

——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日〕石田米子 内田知行 / 主编 赵金贵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Sexual Violence in YuXian*

*Their War is Not Over*

#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 日军性暴力

——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日〕石田米子 内田知行 / 主编 赵金贵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赵金贵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8.6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0190 - 4

I. 发... II. ①石...②内...③赵... III. ①军国  
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②日本—侵华—史料—孟县  
IV. K313.46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8904 号

kodo no mura no seiboryoku-danyantachi no senso ha  
owaranai

©ishita yone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OSHA LTD  
in 2004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查明侵华日军性暴~~  
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和“~~山田米子~~出版基  
金资助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

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 60 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为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轻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 80 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

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决不是在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

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记录了由日本的大学教授、高中教师、律师、公司职员等组成的团体从1996年开始的调查研究成果。这个调查组用了6年的时间，对居住在中国山西省孟县农村中的日军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进行了18次调查访问，在记录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同时，还从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发生在山西省的日军性暴力及其背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以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日军在侵略战争和对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造成的伤害事件的索赔诉讼在日本越来越多地被提了出来，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情况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对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识也予以极大的冲击。

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其实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泛的问题。对于许多有过战争经历的中国人来说，一提到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日军进攻的所到之处对妇女的奸淫强暴，其中有像在攻陷南京时集体性的对妇女的暴行，更多的则是对处于其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的强奸暴行。当然，军队有组织地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也是对妇女性暴力行为的一种表现。显然，这些行为都是违背人道与人性的明显的战争犯罪。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对人道之罪”追究日本军队普遍的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虽然在个别的审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荷兰）的女性。至于规模巨大的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还有有组织地强征朝鲜、中国台湾等当时日本殖民地妇女作为“慰安妇”的行为，在审判中根本没有被触及。

20世纪80年代，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为首的一批韩国女学者开始关注“慰安妇”的问题，并从1988年起开始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进行调查，陆续发表了文章，一度被湮没的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首先以“慰安妇”问题的形式逐渐浮出水面。1990年6月，旧日本军的“慰安所”及“慰安妇”的问题被提上国会，政府被要求进行调查、承担责任。在那之后，学者首先组织起来进行了资料的搜集，日本政府也在学者调查的基础上两次公布了对有关“慰安所”及“慰安妇”问题资料的调查结果，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了谈话，正式承认当时是“根据日本军队当局的要求设立的慰安所”，所以“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及“慰安妇”运送等活动，与日本军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不应“回避历史的真实”，“正视历史教训”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们开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日军性暴力问题，并对中国大陆进行调查的。而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暴力比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更为广泛，更为严重。而将日军性暴力问题简单地表述为“慰安妇问题”是有问题的。正如本书作者在山西省进行的调查所证明的那样，对妇女的强奸行为“不仅仅在中国，在亚洲战场的所到之处都极为广泛、频繁发生着，从总数来说，可以认为超过了‘慰安所’的被害者和攻陷

◆

南京时集团强奸的受害者”。于是，作者提出：这种发生在前线农村地带战场上的性暴力，是有别于攻陷南京时集体性的对妇女暴行与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类型，也可以说是后方的“慰安所”的前线型或末端型。

在读了本书作者的调查，了解了作者的立场与视角后，我也深深感到：实际上，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只是日军有组织性暴力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在战争中不分时间和场合对妇女的强暴，则是日军性暴力行为中更普遍的现象。本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概念就是从当时的日本军人的角度提出的，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侮辱性和很大的欺骗性；而将被日军强暴的处于前线农村的妇女称之为“慰安妇”，就更不准确了。诚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无视这些妇女的受害实际情况，笼统地以“慰安妇”概括，是对被害女性的伤害。实际上，受到这种伤害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应当有庞大的数字和规模，可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确实还不充分。因此，无论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上还是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上，本书的调查研究都是有特点的，值得重视的。

旧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是战后没有得到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遗留，主要是战后审判的不彻底性和美国对日本的庇护造成的，是美国战后实施冷战政策的必然产物，压制了亚洲被害国的正当要求。随着战后国际社会的进步和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社会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大量建立市民团体，在争取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对人权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对战争侵犯人权的行为了有了反省。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是站在自己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谴责战争和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的，但是，也有一批对自己作为日本人的“加害”责任有新的认识和

反省意识的人，在国际社会对妇女权利重视的背景下，在日本社会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意识”受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从加害者的角度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本书的编者们就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不仅是涉及战争赔偿的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战后 60 多年来，日本社会针对 1948 年结束的东京审判以及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右翼与保守的政治家和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派的学者，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强调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坚持理念和正义都属于国家以及民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制造种种否认侵略罪行的理由，对日军的性暴力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否认，提出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有关内容的要求，甚至组织了波及面相当广泛的运动，导致一些地方议会作出相应的决议。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日军战时性暴力行为的揭露与批判就不仅仅是关注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妇女们生活和命运的具体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如何把握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们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视。

首先，本书的学者和许多从事该问题研究及诉讼的律师们是要从解剖这一历史问题入手，端正日本人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促进日本人担负战争责任的自觉，用他们的话说，进行那些活动是在进行“宣言”式的工作。作者在书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对山西省农村受害女性以及村民们进行被害实际情况的听取过程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想去问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日军原士兵们，为什么要施加如此残酷的性暴力？有没有后

悔过？以及被有罪的意识折磨过？战后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进行了那样的询问。正是在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后，作者提出：“战败后过了半个世纪多，终于进入了日本人面对自己的加害行为的时代，去听诉说给我们的少数的士兵的证言，搞清楚实际情况，将记录保留下去——这是今后的一个重大课题之一。”其实，对于中国的学者和关心战争历史问题的人们来说，也需要把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和追究放到那样的宏观的背景下考虑，放到中日 21 世纪关系的大背景下考虑，要把解决战争责任认识作为主要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战后 60 多年来我们关于抗日战争历史问题的研究，其目的也在这里。

其次，作者们在实证性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对受害者本人进行的调查，其询问的细致入微和记录的客观准确，都属于相当规范的实证研究的典型结果。本书第二部分是作者进行的研究性成果，可见在资料证据的搜集上投入了巨大的劳动。这是因为他们的每一项研究结果都要面向社会，必须经受检验，所以需要十分注重准确性和科学性。中国作为主要的战争受害国，搜集战争受害的资料应当说是有优势的，但是在中国国内过去的这一类课题的研究中，仍然有许多“以论代史”的现象，大量的“纪实”性著作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面对这样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在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看似简单，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日本人。说简单，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说容易被忽略，是因为中国的读者往往会从作为中国人的自身历史记忆的角度对该书进行判断，并不一定完全理解日本作者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作为日本人，正视侵略战争期间的加害历史事实，并不是轻而

易举的事情。许多人关注作者们对受害中国女性的同情心，当然，同情心是必要的，但仅有同情还是很不够的。对于日本人来说，一方面需要了解战争中的那些残酷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需要使思想经历一番磨难。而实现了这一过程，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积战后 60 多年的经验证明，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的相互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使中日两国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上理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需要做出相当艰苦的努力。为了从更宏观的高度把握研究日军性暴力问题的现实意义，应当关注日本社会对于以该问题为代表的战争责任的种种表现和研究动向，注意各种各样的“史观”和思潮，这就是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日军性暴力问题的态度，是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晴雨表”，也是承认还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试金石。如果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对建设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很有意义的。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本书的原书最初于2004年4月在日本由创土社出版。正如原书序言中所写，出版此书的愿望是：通过我们七年的当地调查和研究、讨论，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黄土高原的村庄里，有许多遭受到日军性暴力侵害，背负着沉重的痛苦生活下来，在沉默中迎来人生的最晚期，抱憾去世的女性。也有在痛苦中挺身而出，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鼓足勇气，开始和负有加害责任的日本政府进行斗争的女性。同时，也从我们的调查研究方法以及达到的实情认识出发，积极地提出问题，希望由此形成一个加深对战争以及性暴力认识的研究和讨论的共有平台。

在现如今日本的情势下，认真阅读了本书的日本人、日本的研究人员未必会有许多。但是在面向一般读者的许多报纸、杂志、学术会刊中，本书被许多读者、专业研究者介绍，其中不乏内容深刻的书评。

特别如日本全国性学术杂志《东洋史研究》（第64卷第二号，作者：小浜正之）、《女性史学》（第15号，作者：小野和子）等学会会刊上登载的学术书评均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评价。并且对其中所包含的日中战争研究、历史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展开了更深一步的综合性研究。虽然我们

对问题的提出考虑尚不缜密和完善，但对它所具意义的肯定，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本书荣获 2004 年度第 24 届“山川菊荣奖”。该奖项是为纪念对日本的女性问题研究作出贡献、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山川菊荣（1890~1980）而设的，授予当年“在关于女性问题上进行了扎实的研究、调查并取得显著成绩、期待将来取得更好成绩的个人、组织、团体”。评审委员在推荐文中这样讲，本书对侵袭了中国山西省黄土高原的村庄的日军性暴力，“从主观和客观、个体和整体综合起来，作为多层次、立体的构造给与了阐明”，在对受害女性的听取和不断深入交流中，“著者们自身也重新审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突破了既有的历史学”，“在该意义上，可以说本书达到了现阶段女性史的最高点，同时也对历史学总体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我们对能获得如此评价，并由此获得山川菊荣奖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我们的研究方法的特征是，紧紧抓住个别的记忆，从其间的记录来重新认识日军导致的加害和被害的全貌。因此，本书的主角是鼓足了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痛苦，进行证言，由此开始斗争的山西省的女性们。她们不识字，也没成为过历史性记忆的调查对象。即使是自身参加了抗日，或者是由于自己的家族成员以及村庄进行了抗日活动而遇害的女性，也是在责备自己、对自己感到羞耻并将痛苦紧锁在漫长的孤独和沉默中生活下来的。在日军的加害中，性暴力受害是最难以被注意到，最难恢复自身尊严的残酷的受害。要想恢复她们的尊严，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政府的认罪、赔偿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对于日本公民，要想挽回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也有日本公民必须做，而且可以做到的事情。本书作为这样一

本翻译著作在中国出版，就是希望它能够向广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身为日本公民、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我们在考虑什么，想做什么的资料。此外，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使中国的诸位读者在了解出现在本书中的受害女性的具体受害实情、日军加害内在机制的同时，更去接近她们的思想和斗争的契机。

当然，作为加害国一方的国民，我们在被害国中国出版有关日军性暴力实情的调查、研究的译书，无疑伴有紧张的心情。我们从心里期待广大的中国读者，有关历史研究的学者毫无顾忌的批判、提出建议，也从心里期望能以本书为素材，更进一步加深有关日军性暴力的具体实情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以及作为普通公民、作为研究学者的交流和合作。

本书保留了原书全部内容，没有进行任何改动。但在以下地方和原著不同：第一，在2003年原著完成2年后的2005年11月，以在本书进行证言的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为原告在日本法院所进行的诉讼被不公正地判决为败诉，因此在“调查概要”的末尾，简单地将这两年的事实经过进行了补充说明；第二，原著中选用了“中国方面文献资料”《孟县文史资料》中记述的“惨案”部分，这对于诸位中国读者来说，可以直接去读原文，所以没有进行转载。

此书的翻译委托给了山西大学日本研究所赵金贵副教授，他是我们当地调查和研究中最好的合作者之一。对于被害女性、农村居民，以及往来于日本—山西农村之间的我们的心情和想法，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翻译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我们代表原著方从心里表示敬意和感谢，同时对于大力支持他工作的山西大学校方也表示感谢。



在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长，以及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林伯耀代表的理解和大力支援，对于接受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别是对于总编助理杨群先生，以及编辑中心主任宋月华女士的积极鼓励和合作，从而使此书得以出版，我们代表原著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石田米子  
原著者代表 内田知行  
2007年8月